

文霧中的迷津

李福鍾

中國的現代化始於十九世紀中西文化大規模的對壘與衝突，始於中國文化在這次對壘與衝突中絕對性的失敗以後。
——金耀基

一、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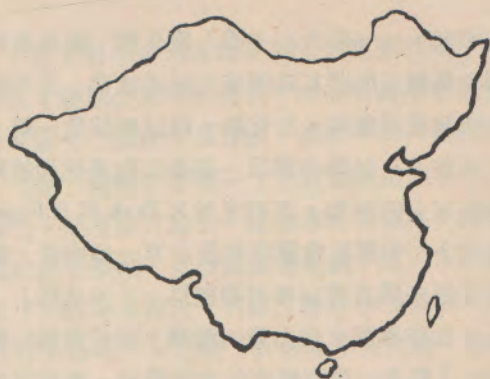
中西文化第一次較廣層面的接觸起於十六世紀末葉及十七世紀初，由一批基督教傳教士引進「陌生的宗教」(Strange religion)(註一)而揭開序幕。然而稱「陌生宗教」與中國文化形成對壘，毋寧說中華帝國以她慣有東道主人底好客態度奉之為座上客來得恰當。禮遇之，但不香火鼎盛。到底經過當年「印度化」(Indianization)的波瀾，中國文化對待洋和尚的態度是縱容多了。況且只信上帝不拜祖宗的「教義」實在不足以取悅當時的一般民衆，故第一次的文化接觸倒沒有為中國古老的社會制度帶來明顯的變革。利瑪竇、南懷仁的最大貢獻也僅限於曆法巧工的介紹與輸入罷；中國依舊中國，蒼老依舊蒼老，等到康熙老子一死，雍正幾道聖旨就炒了洋和尚們的魷魚，逐客令一出，西方的「陌生宗教」只得乖乖打了退堂鼓，中國再度關上了朱漆門。

但百多年以後，當「西人、夷狄」再度出現中國舞台時，他們已經通過了工業革命的洗禮，擁有的力量實已不是東方這個古老的農業社會所能望其項背的。一八四〇年以鴉片戰爭強迫進口了「陌生技器」(Strange technology)(註二)，打破中國大門，迫訂盟約，主客易位；雍容華貴的天朝尊嚴一下跌了停板；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形式所迫，乃不得不尋應付之途。從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曾、左、李之自強運動；從英法聯軍的兵臨城下到甲午之戰，中國士大夫以赤腳醫生的「土法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來治此番中國數千年來難得一見的大雜症，實註定了他們必敗無疑的命運——但我們不該責備，而應抱以同情。

其實「陌生的技器」本身是無罪的，罪惡的是西人不以聲光電氣、舒適便利來取悅東方世界，而以船堅炮利、帝國強權破門而入，強取豪奪。儘管中華帝國滿朝文武高呼漢賊不兩立，深以披髮左衽為恐，但情勢哪裏阻擋得了，洋槍大炮對付弓刀騎射便如摧枯拉朽，難怪大清皇朝要兵敗如山倒了。雖然當時大臣中有「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機器為公憤者」(註三)，但中國之羸弱為事實，中國之一敗塗地更是事實。科技不如人雖是恥辱，但亡國滅種則更恥辱之尤：兩相權衡，似乎以「天朝」的「夷狄化」要划算些。縱使「西學為用」是「有辱國體」，但總比永絕國祚要好些吧！這大概就是清朝中葉開始的第一期現代化領導者的一般心態。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滅人國族、毀人宗廟，這批古中國社會的「秀異份子」(Elites)便不得不做一肯定與下一決心。肯定中國的器物科技落後西方，而精神文明社會制度則仍居領先地位；所以下定的決心只是要師法夷技，以其道還其身。由此可知，晚清中國傳統社會的士大夫是以「圖強」與「報復」為出發點的。如倭仁大學士與學者魏源等皆堅持嚴守華夷門戶，深以披髮左衽為憂。俞正夔以西洋技器為「鬼工」，楊光先「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故當時曾國藩、李鴻章等所倡導的同光洋務運動仍只是為「制夷」而「動」，非真知病源之所在

歷程



，更無論治得此番大病了。比如同治十三年英人修成淞滬鐵路一段，但光緒二年便被地方士紳買回掘毀，連鐵軌都送進了龍五廟！原因何在？只因修鐵路破壞祖上風水，留它不得。此事語之外人或覺可笑，但身為中國人怎笑得出口；我們不止該同情，而且該深以為憾。不管如何洋務，如何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人民素質不提高，政治制度不改善，苦力、小腳、八股、鴉片煙、衙門夾棍、暗無天日的牢房等等見不得人的「寶貝」，如何有辦法談現代化，談國家富強。故而練兵製器了三十年，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一下子把中國人僅存的一丁點兒自尊打得片甲不留。徐桐父子的悲劇性結局（註四）便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士大夫哀莫大於心死的寫照。

其實清季較有遠見的思想家如郭松壽，此人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出使英國，寫了部遊記，裏頭有一段文字大略是說「理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雖然這部書後來被滿朝文武人人唾罵，日日參奏，而弄得奉旨燬版才了事，但事實畢竟如此。中國士大夫為維護剩下的一點兒支離破碎的自尊，祇好提出「中國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質文明」的論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夷狄科技是不得已而用，華夏本位則千變要守。聽似合理，實則矛盾。將文化二極化的結果，只是如一會兒吃冷，一會敷熱，腸胃經是要鬧病的。西方的精神制度我們不去領會，而只重科技表象的攫取，難怪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結果還是失敗，中國淪亡之勢仍是不可挽救。因為官僚仍舊官僚，陳腐依然陳腐，千百年的積垢陋習決不是臨陣磨槍式的「不亮也光」所解決得了的。因此繼曾、左、李、胡之後的代表人物——康梁，便更深一層地由政治制度下手了。這種新的覺醒，也為將來民國初年的新文學與五四運動埋了伏筆。

這就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巨變底序曲，當由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幾百年間所建立的西方近世文

明以挑戰姿態出現於中國古老的歷史舞台時，中國古文化不管是外在的或內在的力量一時之間都無法做成功的阻擋，以湯恩比（A. Toynbee）的解釋來說，中國社會作了一次極其失敗的「回應」（註五），而失敗的結果，也就註定了這一百年來，在政治、經濟，尤其是文化上，一連串的錯誤與痛楚，迷霧與孤獨。

二、文化誕生期底陣痛

隨同治年間洋務運動的開始，中國知識分子（當時以士大夫階級為代表）知覺或不知覺地走上追求現代化的路途。其最初本意當然是為着「雪恥圖強」而「化」之，倒沒有真正體認到現代化與理性化一途正是中國此次的大變局中所該秉持的信念；而更由於他們對本身時代的認識是茫然多於理智；不敢想遠，亦想不遠，故百年之間引領着中國踏着零碎底步伐前進，不是遇山開路、遇水架橋式底果決，而是走一步算一步的沒自信與摸索而行。

要了解此次西力東侵與它對中國傳統社會所造成的震撼實際上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但如從中國古社會的本質來摸索，縱是瞎子摸索，也該可以摸出一個大概的神髓。

中國數千年來是以農業為本的一個自給自足地社會系統，雖有其傳統的科學技術，但從未有西方科學革命之出現。科技只應用於日常零星的生產與製作上，未嘗有過大規模地科技革新與整理。中國傳統的社會價值觀重天人合一，重倫常關係與和諧完整。錢穆先生謂中國文化之特質是「調和協合」（註六），唐君毅先生稱中國文化精神在「融合貫通于一統」（註七），皆極中肯。另外政治體制上，錢穆先生亦有一段精闢的見解：「……就中國歷史講，政治統一為常態，多統是變態。……我們還可更進一步講，中國史上雖在多統時期，還有它一統的精神。」「中國人的國家觀念，是一種道德的國家，或是文化的國家，所以必然要達成到天下

的國家，……因此在中國人觀念裡，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是儘可能將其範圍擴大而達成為一天下的。……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應該是一統。……」（註八）此稱中國以一道德文化系統而維繫「一統國家」的論點，亦可見於R.Park與B.Russell（註九）。中國社會嚴格來說不算一個國家，唐君毅先生稱中國自漢以後可謂純為一「文化國」（註十）；此等維繫文化力量的濫觴，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賴着一深密繁富的文字傳統、教育制度、考試制度，乃能代以繼代，綿延不絕。」（註十一）故中國二千多年來政治上雖多治亂興亡，改朝換代，但整個社會制度與基本結構並無大變；有變亦止於在傳統之內變。「我們可說，古典中國社會，無大變局，亦非全停滯，而是呈現一『移動平衡』（*movig equilibrium*）狀態。」（註十二）梅篤（T.T.Meadows）稱中國人是文明社會中最多叛亂性而最少革命性的民族，實不難想見。

然而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已不是任何一個古舊的傳統農業社會所應付得了的。由資本主義的擴張，爭奪市場，中國面對的是一經過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錘煉過的敵手，不僅在聲光電氣上中國只有全盤接受的選擇，甚在社會文化的比較上，中國也相形見绌了。誠如郭松燾所言，西人亦有他們兩千年的文明，更何況經過文藝復興後，西方恢復以人本的思想，由出世而入世，神性而理性，不論文學、哲學、美術、音樂，都是爭相競妍，一日千里。隨着工業革命的迅速推展，歐洲也曾經歷社會變形期底陣痛，而十九世紀西方的入侵東方世界，便是以它們經過了數百年成長的文化——挾持着工業科技——強逼著東方國家接受其模式；囫圇吞棗的結果，既品不出其內在佳肴珍饈，中國只得以最直接、最表層的感受來尋出路了。所以百年來中國由謀求船堅炮利的假象到五四以後對整個中國古文化的大翻修，其所以如此，可以說是導因於現代化初期的認識淺薄；而所以會認識淺薄，追究起

來，中國人近於頑固的「天朝自尊」似乎該負一大半責任。

為了解中國這一百年間在文化與價值觀向上所遭遇的難題，我們不妨為近代史做些分期的工作，一方面了解近世中國在千年的歷史舞台上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另一方面認識她在這個大洪流裡踩過怎樣底步伐——蹣跚、躊躇？亦或盲目、衝動？實際上，也惟有中國新生的一代瞭解了上一輩的知識分子——或可說一切曾為中國現代化努力想過，嘔心泣血者——身上所負的包袱，與留給下一代的重擔，這樣我們才能知曉如何醒悟，如何奮起；而經過這層理性覺醒過的中國，才有資格繼續背上五千年的遺緒，再踏出堅實的下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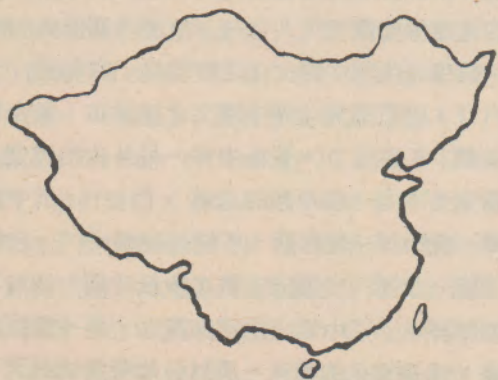
依殷海光先生的看法，中國文化在近百年來遭遇西方近代文化衝擊時所作實際反應的進程，大致可分三大步：

第一步，外層的改變。中國文化外層的改變即是開始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器用特徵。學習西方文化的「船堅炮利」就在這一層。

第二步，中層的改變。中層的改變是制度的改變。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從事的「變法維新」屬於這一層。

第三步，內層的改變。內層的改變係指對中國文化的基本前提、基本價值、基本觀念、以及倫理規範的挑戰而言。文化的改變到了這一層，就是「太歲頭上動土」，一定引起嚴重的反擊。吳又陵，早期的胡適，以及後來許多要改造思想的知識分子的重要努力，就在這一層中。「打倒孔家店」是在這一層的中心節目。相應而起的「保衛孔家店」和「翻修孔家店」也是在這一層的重要節目。（註十三）

第一階段器物的現代化是以「自強運動」為本體而施行的一連串政策，包圍着求「堅甲利兵」這個原則，而實施某種程度之讓步與變革。領導的諸位大員，包括奕訢、文祥、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



章，他們對於中國之隱憂與當世潮流之認識終屬有限，所以總無法對症下藥，反而延誤日久，終至病勢垂危。如蔣廷黻先生所言：「他們對於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於西洋的科學也相當尊重。並且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是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外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了舊的制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從曾紀澤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所著「中國先睡後醒論」稱中國「不過似人酣醉，固非垂斃」以來，一般人論及百年來的中國，頗愛以「睡獅」自居；蓋睡也，非病也！——看似滿懷「民族意識」，實際上仍是自我安慰的另一口氣罷了。甚至比張之洞的「中體西用」更迷惑人心。我們且來看看錢賓四先生的一段話：「晚清之季，誤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夫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註十四）故曾左李諸先生雖「洋務」了三十年，自強了老半天，只盼能使睡了中國醒來；——醒是醒了，可是病體依舊，醒了的仍只是一軀病入膏肓底空殼罷了。故而甲午戰後，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認識因前人之失而進了一步，知道中國再不能不變。以日本的維新經驗，暗示中國似乎可以「日本模式」為變革的一個參考。梁啟超皇皇六萬字的「變法通議」，便開了中國現代化的第二階段，由器物的現代化，進而追求制度的現代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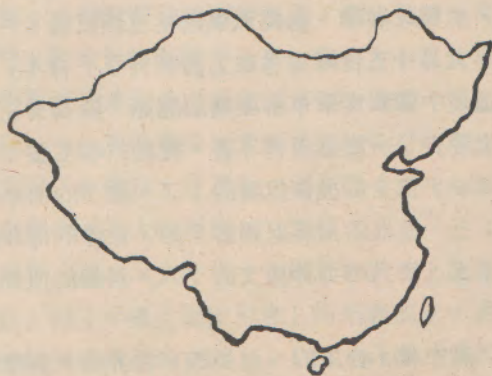
制度現代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為溫海光先生認為其最後所以失敗有三大原因。第一、康有為急於事功，不以循序漸進而委婉行之，終至偃苗助長，維新變法僅百日便早產夭折了。第二、變法不幸捲入皇家權力爭奪的私務，註定其不得善終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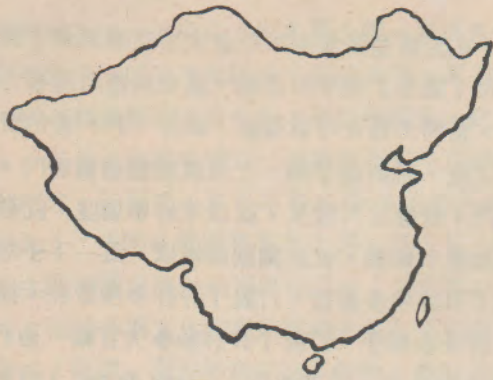
「在光緒皇帝集團和慈禧太后集團為要『變法』和反『變法』而爭的幕後，藏有新舊兩種權力的消長。舊勢力為保持其聲威，祿位，和利害的實質而打主意。維新份子剛一上台就截撤這個衙門，那個衙門，就廢除八股文，就改革科舉制度，就截除空糧以節省餉糈，就鼓勵創辦報紙。這一下子等於沒收了許許多多荷包，打破了許許多多飯碗，摘掉了許許多多帽子，打翻了許許多多大官轎。他們當然要反撲。在一次苦迭打（Coup de'etat）中，維新的幼苗被摧毀了。」（註十五）

其實回顧過往，康梁所提倡的維新若能成功，則將是中國走上一條比較平坦，少坎坷，與少不必要浪費的路途。可是他們畢竟失敗了，他們一失敗，中國只好走上用激變的方式去求政治制度上的現代化。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便是第二階段現代化中，以激變與革命方式而謀求得來的成果。

「可是，……內容的更新實在沒有換個招牌那麼容易。一家很老的商店，雖然換了主人，換了經理，換了字號，也換了組織形式；可是基本的營業方式仍舊，店員們的基本習慣，顧客們的心理仍舊。民國形式的出現，並沒有能夠給中國產生一個真正的統一政府。在舊的統一政府的瓦解中，湧出一些大大小小自立為王的軍豪。這些軍豪除了從事了無已時的兼併殺伐以外，多不知現代化為何事。三十年代由南方衝出一個新的勢力中心。這個新的勢力中心可望形成一個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動力系統。但是，時代和環境對它不利。它還沒來得及確實鞏固它自己並發揮出足夠的新力量，就受到各種因素的合成剋害。舊社會腐蝕着它，軍豪直接打擊它，波爾希維克的狂風不斷從烏拉山過來吹襲，更加上日本軍人對中國發動武裝侵略，遂致中國不可收拾。對外的民族戰爭和對內的社會衝突一起迸發，野火燒遍了原野。以京滬為重心而向四面輻射的一點現代化的勞作變成了灰燼。」（註十六）

現代化的第三階段是所謂思想的現代化；這一





階段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波瀾最壯，影響最遠，創痛最深的時期。由文學革命運動到大陸淪陷與文化大革命，中國經歷了最不可思議的六十餘年。新思潮、新觀念，紛然沓來；而時代的動盪與不安更加速了中國思想與文化界的一片混亂。由文學改良、文學革命，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一直喊到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俄化與西化；惶惶終日，無所定論。

其實中國值此時期推行它的思想現代化是不幸的事實。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以後，數百年間，思想與文化取向的探求仍處於摸索前進，匍匐而行的時期。尤其在玄學與科學的消長交替時期，各派學說更是莫衷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義不僅祇在政治上而已，它更牽扯到各種社會與思想上的因素；所以此次大戰實際上便替西方近世文明亮了紅燈。史賓格勒的「西方沒落」（註十七）便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完成的作品。而不幸的是，中國求近代思想的大規模運動適逢其時；既然老師本身的學問已有了問題，怎能企盼把學生教好！所以這幾十年來的混亂、不安，成長與摸索，都像極了阿米巴式的嘗試錯誤。錯誤儘管可嘗，然惡果就難以消受了。這一階段求思想現代化，到頭來終是功過交雜，譏譽參半。原可坦然而行，最後却顛踣屢屢。對於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而言，此前人的精神包袱也着實夠重了。

中國思想知識界之求新求變在五四之前早已開始，然風起雲湧、蔚為風氣則在五四以後。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陳獨秀在上海創刊了「青年」雜誌，這是中國新文學革命埋種的開始。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敬告青年書，提出六項主張：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其中像「自主的、進步的、世界的、科學的」

都是極重要的概念。以後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這時大概也有了基本的雛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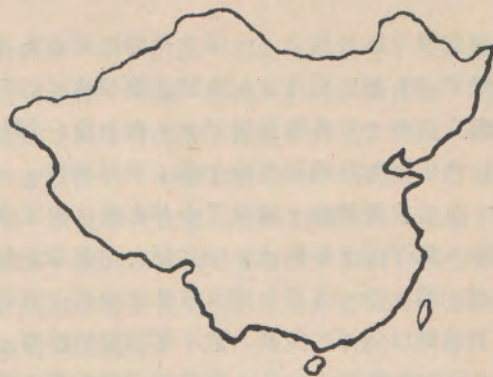
一九一六年，陳獨秀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文科學長，他一手創辦的青年雜誌便也跟着北上，並且由原來「一枝獨秀」的局面變成了「集體創作」。胡適、周作人、朱希祖、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等人相率加入，於是青年雜誌搖身一變，成了北大致力文學改革的少壯派同仁的刊物。從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起，青年雜誌二卷一期正式改名為「新青年」，成為鼓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號角。

本來文學改革運動的確是有它時代需求上的意義，但由於領導人本身的認識就極為有限，他們的時代背景、教育背景，以及訴諸於情緒方面的非理智，都大大地將此一運動的成效打了折扣。胡適後來認為新文學運動的失敗要歸咎於陳獨秀等人將之政治化是不無道理的。筆者不擬在此陳述新文學以及五四運動始末，因此問題牽扯甚廣，實非此處所能盡書（註十八）。至於這一階段對以後中國的影響才是本文所要着重的。

其實廣義的五四是一多面向的運動，由文化、思想的重新評估，推廣到社會、制度、政治各方面的變革；就其影響而言，實屬空前，至今仍未蓋棺論定。此一期間，因要求「賽」、「德」二先生在中國土壤「落戶」起見，便不得喊出對古老傳統的重新評價與再認；甚至更衍出疑古、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禮教與廢除漢字等主張。民國八年一月新青年六卷一號陳獨秀所寫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講得很清楚：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這段文字雖不免嫌誇張了些，但倒也把新青年領導人物的心態講述得很明白。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少壯派在意識到中國這個老大國家不得不



來一次總結算、總變革後，便一致採取了一個對傳統敵視的態度；此一態度的外在表現，便是在「傳統」與「變革」之間劃上一道鴻溝，壁壘分明、互相抗衡。實際上這種「傳統與現代是對立的，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的觀念，正是五四以來一般知識分子所認定的最嚴重錯誤。「在這樣的二極化的形勢之下，整個社會的力量勢必分裂而相互抵消，一方面傳統固遭到不必要的歪曲、損傷與破壞；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也受到不該有的阻擾、反對與打擊。」「傳統與現代之間是沒有楚河漢界的，傳統與現代之間乃是一生生不斷的『連續體』，是剪不斷，斬不開的。中國的現代化只在追求中國民族的獨立平等、中國的工業化、中國的民主化……在這些追求之中，當然必須對傳統加以整理、評鑑、批判乃至部分的揚棄，但中國現代化決不是也不必對傳統的全面否定。再明白的說，中國的現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極地對傳統的巨大的摧毀，而是積極地去發掘如何使傳統成為獲致當代中國目標的發酵劑，也即如何使傳統發生正面的功能；而不產生負面的反功能；更深切地說，中國的現代化旨在促致中國的富強，而使其傳統可免於痛苦的傷亡。在這個意義下，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是可以相輔相成的。」（註十九）其實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共生性與兩者呈「互以為力的雙元體」（reinforcing dualism）是不難找到證據的，日本現代化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日本社會善於平衡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比重，減少其間的摩擦，久而日漸融合，便成了新日本誕生的一個主要助力。廿世紀日本人在白人世界中昂然擡頭的事實，證明了傳統與現代之間不僅可以並行不悖，甚至兩者更是縱的連接，而不是橫的移植。兩者是可以連貫在一大脈流中，而繼續延長其傳統的壽命的。但五四的「大員」們却不太懂這個道理，一味強幹硬拼下，捨了傳統而盲目求變革，以為被他們膚淺認知了的「民主」與「科學」足以救中國，難怪後來產生的確是叫人嘗也不敢嘗的

惡果。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四發生的同時，「新青年」六卷五期出版了「馬克斯」號的專刊，其中有陵霜的「馬克斯學說批評」；劉秉麟的「馬克斯傳略」，李大釗的「馬克斯主義觀」，陳獨秀的「馬克斯研究」；這些是最早把馬克斯思想具體地介紹進中國。而同時期胡適亦從美國進口了杜威的實證主義，於是兩個不同的外來思想在中國相遇，遂打起了擂台來。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是十分複雜的，由於古今並存，東西雜處，各種意見，各種主義，各種學派，由於主張分歧，想法各異，於是大大地打了幾場筆戰；如尊反孔之爭，胡、梁東西文化論戰，胡、林文體論戰，以至到最後大規模的「科學與玄學」大論戰，都在在顯示了當時的文化思想界是如何地亂成一團了。不過這一堆「越洋貨」裡最後脫穎而出的還是馬克斯的學說。我們且來看看遂耀東先生的一段話：

馬克斯的思想輸入中國，有其歷史背景的。一九一七年進行了四年的歐戰已接近尾聲，但勝利和失敗的雙方的處境同樣黯淡。因此使得當時許多西方知識份子，對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所創造的西方文明，有了一個自我反省的機會。因而連帶對於工業革命所形成的資本主義，也有了檢討和批評。當然對於資本主義批評最徹底的，就是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因此馬克斯的思想便應運而出，成為當時歐洲知識界最流行的思想。就在這個時候，列寧用馬克斯的思想，作為實際政治鬥爭工具，領導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對歐洲的知識份子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因此他們對利用馬克斯思想完成革命的俄國，寄予無限希望。……馬克斯的思想既是當時流行的思想，而且引導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因此對中國的知識份子，也發生了很大的刺激。（註廿）

所以到了二、三十年代，「創造社」、「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文藝家協會」的相繼成立，馬克斯「普羅列塔列亞的文藝」（Proletariat，無產

階級文學）終於掩蓋了中國文化界的所有光芒。其間雖然還有類似新月社此種純文藝學術性的團體出現與之抗衡，但終如流螢星火，無力挽狂瀾於既倒。紅色思潮如狂飈似席捲中國；黃河決堤，一瀉千里。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中共在政治與軍事上的成功。到了四十年代末，中共便輕而易舉地佔領了整個中國大陸。這是中國百年來求現代化路程上，一項最難以彌補的災禍，最不堪回首的慘事。我們後一輩的知識份子，人人都該為這場悲劇的導出負上一肩底道義與責任。

悠悠歲月，倏忽百年，「後人看前人走過的腳跡是容易的；前人要看法後人的路却是茫然。從一個古老的文化到近代化該怎麼走，我們從來沒有這個經驗。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而等到發覺走又了路，使得再回頭，重新再來。這樣行行重行行，錯了再錯，改了再改；一百年過去了，這一百年間的大半日子裡都在摸索，摸了大半個一百年，才在近二、三十年露出了一些兒曙光。唐德剛先生說得好：「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的開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滙流的開始——必然要有個極長的摸索時代，啟蒙大師們無一而非摸索專家。……」從曾左李胡開始，到梁啟、胡適之、梁漱溟、陳獨秀，再到唐君毅、殷海光，中國結結實實摸了一百年；好的摸了，壞的也摸；有的摸了什麼講什麼，有的摸不著邊也跟着張開嘴巴喊。尤其在一、二十年代，就如唐德剛所說的：「那時的中國士大夫被洋人嚇昏了頭，對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個留學七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重洋歸來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在中國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國初年那一段！那時的美國留學生才真是說一不二。連表大總統想做皇帝也要以哥倫比亞大學的古德諾教授（Frank J. Goodnow）一言為定呢！」（註廿一）基於這種心理，當時原裝進口產銷的「洋貨」

是要比土產的「國粹」派引人多了。而一般知識份子更恨不得攀上個某某主義者的門檻兒。到底，掛個馬克斯主義的招牌——不管有幾成真貨——總比捧上幾冊線裝書要時髦得多吧！

中國近幾十年來的如雷貫耳的言論，大都是些舶來的或土產的或二者混合的美麗諾言，高懸的意底牢結，及包天蓋地的偉大計劃。這些言論之「深入人心」，並不靠他們能否解決問題，能否在實際上行得通，更沒有多少人去考慮到須要犧牲多麼鉅大的代價。這些言論之所以「深入人心」，多是由於他們能挑起一般人的直接反應，引起一般人的幻想，激起一般人的仇恨，煽起一般人的狂熱，逗起一般人對未來產生美麗的憧憬。祇要這些言論被一般人接受了，他們就成為「政治的宗教」的教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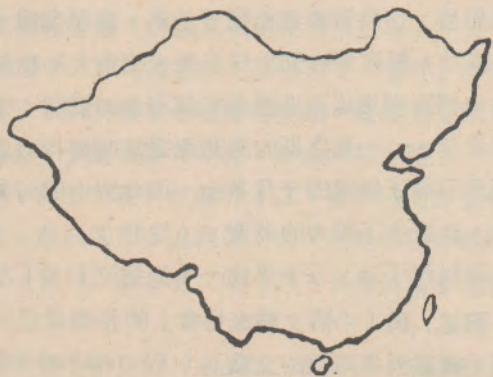
……

近幾十年來，一般中國知識份子之接受那些高懸的意底牢結及包天蓋地的偉大計劃，是靠着什們通路或藉着什麼工具呢？說來實在令人遺憾得很。自五四運動以後，一般人之接受那些大觀念並不是靠科學理論，並不是靠統計數字，並不是靠工程師的設計。這些太「枯燥無味」了。他們多是經由詩歌、小說、漫畫、木刻、唱遊、戲劇，甚至標語口號等等來接受那些大觀念。這實在天真！（註廿二）

相較起來，數十年後殷海光的這些見解是要顯得理智多了。

三、世界性衝擊的來源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皆不同。」要了解中國現代化的時代背景，還是得從十九世紀西方勢力的向外擴張與其對世界其他文化、或政治上的震撼講起。當西方接受了工業革命的催生後，工商業的發展弧線呈直線地上昇；又由於重商主義底盛行，極需擴展市場與奪取資源，自然當時閉鎖的東方世界是他們急於爭取的對象。這時西方的勢力正



像一個發了酵的麪糰，急速地向四方擴散，東方的幾個古老文化都同時受到其威脅，如日本、印度、伊斯蘭；自然也包括了中國。所以說十九世紀的西力東侵並不僅僅限於中國而已，它事實上是一全球性的大變動，由西歐數個完成了現代化過程的國家，有意或無意地，帶領了其他地區的人類，踏上現代化的路程。「上面所說的四個文化，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本來是以完整而又獨立的地位和西方文化並存的。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文化因受工業革進的推動而四面擴張以後，這些文化都紛紛作崩解性的激變，無論是從上至下也好，或是從下至上也好，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變革，都在像放連串爆竹似的出現。這些變革猛烈地摧毀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及藏在其中的價值觀念。這也就是說，上面所述的四種文化與西方工業文化接觸時引起了基本的損毀。因此，一個世界性的文化在互相衝突而又互相調整的程序裡塑成中。」（註廿三）既然這次的變動是世界性的，我們不妨論四種文化在這次變動中所生反應的功過得失。

十九世紀的回教世界在有財有勢的西方壓迫下，漸漸衰微。古老的「聖律」既無力維持其過去的權威性，且亦無法與由西方勢力所形成的激變社會適應，於是由十九世紀到廿世紀，古老的伊斯蘭社會與思想的整合性便逐漸瓦解了。這和近代中國的情形是極類似的。「儘管原來樣子的聖律已不復能夠成為行為的規範，但很少人在口頭放棄它，也很少人在表面放棄他們所信奉的宗教。不過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伊斯蘭人對於傳統伊斯蘭的僵硬規律感到不耐。」就由於這種矛盾必理的影響，伊斯蘭的一般知識分子也和中國的一樣，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劃起了一道鴻溝，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兩者的融合。

相較起來，印度求現代化的路程就比伊斯蘭世界要來得容易得多了。印度宗教沒有主義式的定義，這使得印度人比較容易就西方文化的本身來考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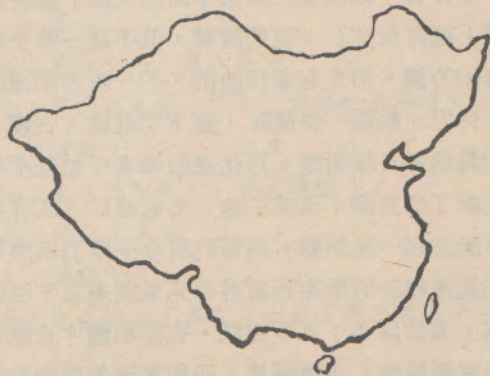
它的利弊。另一方面，印度長期接受了英國的統治，近代法律、軍隊、組織、科技以及交通，尤其是行政制度與教育制度，都受到長遠底熏陶。這些條件的建立便利了印度人學習西方的觀念、思想、文學等。所以印度在現代化的路途上所受阻礙是要小了很多，而且印度的知識份子可以調和於印度的本土文化與西方近代文明的社會形態之間，這更是一個最有利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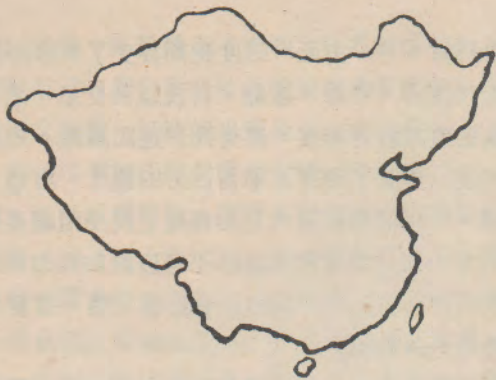
至於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到二次大戰前，日本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西化速度是亞洲首屈一指的，而且證明了東方國家可以藉著充分的現代化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進而擊敗西方。所以說從一八五四年「伯力里船」進入日本後，日本西化的快速直可令人瞠乎其後；而其所以如此，也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

自紀元六世紀日本的漢化以來，一千年間吸收着中國文化裡較高的文化要件或技術。這一事實，給了日本一個暗示，就是一旦外國文化比本國文化優越時，向外國學習便是順理成章的。既然日本文化分子有這種感覺，於是他們向外國文化學習時也不覺得是丟臉的事，他們不因顧到空虛的面子而拒絕模倣外國的文物制度。這是對現代化有利的心理條件。「他們的祖先崇拜不僅沒有妨害他們西化，而且為他們的西化鋪平了道路」。

相較起來，中國知識份子的態度就顯得冥頑不靈了。他們先以為要守住祖宗的產業便不得不反西力東漸，而等到上了當，學了乖，眼光放亮了，便又一腳踢得「吃人禮教」靠邊站，拼命追隨一些不太成熟的主義口號高聲吶喊；論起來，也實在是國家民族的不幸。

由以上的比較得知，並不是說近代的西方文明特別與中國為難，各位讀中國近代史亦不必咬牙切齒，大有不能罷休的仇洋外。其實這次的變動是世界性的，受波及的不僅是中國，而是全世界。我們唯有認知了這個事實，才能免除掉不必要的心理障





礙——不管是自尊或是自卑，繼而追求更進一步與更有效應對之策。亡羊補牢，時猶未晚。

四、回首暮雲遠

歷史是人寫定的；開幕的是人，收場的也是人。經過無數劫難，招劫的是人，應劫的更是人。我們只問當如何應劫，其有所為與有所不為；至於逆料劫難之將至，而一味求順勢苟安，任其猖狂，終至於糜爛不可收拾，豈吾人所能容忍，而如果此則我等更有何面目面對上一輩的諸位先賢；至少他們都曾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盡了一分力。或許走錯了路、走偏了方向，但若少了他們的力，我們依舊會再走錯。今天就因為有了他們的經驗，他們血和淚的教訓，才得幫我們跨出迷霧，跨出繞了近百年的迷宮。所以不論曾、左、李、胡，不論康梁的維新，不論孫中山先生、胡適、或陳獨秀，如果他們成功了，我們自當給予尊崇；要是後人的眼光認定了他們一生的總敗，我們亦不該加以指責，他們理當有其歷史上的地位；至少比起那些苟活於世，眼光淺短，或爭權奪勢，或為名為利者，其去直不可以道里計。

其實自從五四以後，文學思想界已有一批有識之士慢慢醒覺了過來。當實證主義、馬列主義喊得高徹雲霄之際，他們亦未嘗向這些刻意雕琢出來的金剛羅漢頂禮膜拜。他們是一批耐得住寂寞的學者。這些所謂的「新儒家」們倒也深知中國之當變，不能再像一般陳舊迂腐的「國故大師」視變動祖產為「離經叛道」。他們講變，但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變，而是有選擇性的。把一幢古廟裡的塵封、污垢、蛛網一併掃除，留下它莊嚴、古樸、神聖的真精神。相對地，西化派的學者立場就不同了，先拆了廟再說；夷成平地，另起爐灶。或許有朝一日能蓋起一座新廟，但需耗廢多少精力與資財！更何況蓋起來的新東西或許漂亮艷麗有之，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古廟裡有的是宗教精神，香煙嫋然；而新廟却像個糖葫蘆，油

亮有加，肅穆莊嚴可就差遠了。只可惜新儒者們的努力還是要經過文化催生的陣痛後，才漸漸地為那般大病初癒、理智抬頭的知識分子們所接受。關於這些，殷海光先生有一段極沈痛的話語：「……陶醉至極，可以使人昏迷。昏迷的人，最易受到思想的催眠。二十多年前，我曾看見『唯物辯證法』催眠了那麼多陶醉於那種『哲學』的中國知識份子。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任何一個精於西方現代理論哲學的人士被『唯物辯證法』所迷。因為，憑他們的訓練，他們很輕鬆地知道『唯物辯證法』不過是一種玄學的迷執。玄學迷執之根據，除了是玄學的迷執以外；還有什麼呢？可是，長年習於中國本土『哲學』語言及浸沈於浪漫思想的中國知識份子，碰到了遠處飄來的玄學迷執，真是『一拍即合』，無法抵抗的。」面對前人的教訓，我們豈能不有所警惕。

這批所謂的新儒家，像梁漱溟、張君勱、唐君毅、殷海光等諸位先生，他們更能抓緊中國傳統中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重人生性格的真實修養與理智地明確思考。除了對傳統精神的再認外，他們也更進一步做了「整理國故」的要求。這種情懷，的確是值得吾人大書特書的。

今日的台灣，不管在政治、經濟、社會上，處處呈現着中國在近一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富足與安定情況，也可以說，是百年歷史上最具有理性的時代。這種成功決非偶然，主要是政府能以理智態度處理政、經問題，各方面採循序漸進，因勢利導的方法；不好高騖遠，大搞意識形態的遊戲，而以確實穩妥的步驟行之。金耀基先生（港大新亞書院院長）認為台灣過去三十年來能於民主在世界各地退却的退潮聲中前進，便是歸功於她已自覺、不自覺地跳過埋葬了許多國家的二個政治陷阱，一是「馬克斯情景」的陷阱，二是「極權統治」的陷阱（註廿四）。其實這不是台灣得天獨厚，鴻運當頭；而是老一輩他們吃了苦，上過當。台灣今天的成就不是憑



空得來，這是在種種歷史教訓後，痛定思痛，慎切地信服與實行三民主義的結果。三十年來的經驗證明，孫中山先生的學說理論的確是最適合中國人的，外國研究政治思想的著名學者如葛來格(GREGOR)、墨子刻(METZGER)也作相同的看法。

的確，我們今天回看前人的腳跡是歷歷在目的，可是前人的腳步既已成了歷史陳跡，我們在此替古人擔憂亦於事無補。重要的是，在面對未可知的歷史抉擇時，我們有幾成自信，有多少把握；或者只是如前人一樣盡在嘗試錯誤；甚至更糟？——沒寫定的歷史本無從逆料，我們當然無法知道百年後的子孫該怎麼來寫我們；但E.H.Carr在他的「WHAT IS HISTORY？」裡寫道：「一個有歷史意識的民族很少會見到『歷史重演』，其理由之一是，第二幕的『演員』已經知道了第一幕的結局，這知識不能無助於他們的行為。」前車之覆足為後人鑑，今天吾人既已從繞了許久的思想迷宮中脫出，當更能清楚知道自己正站在歷史舞台的哪一側才對。筆者期望在面臨今日身處的這個大時代洪流時，能有更多的知識份子站到理性陣營的一邊來；則這不僅將是你我之福，更是國家之福。

最後，僅以胡適之先生的一段話作為結尾，也同時表示我個人的一點兒願望。

有人對你說：「人生如夢」。就算是一場夢罷，可是你只有這麼一個做夢的機會；豈可不振作一番，做一個痛痛快快、轟轟烈烈的夢。

一九八一、九、三

註一：見湯恩比(A. Toynbee)著“The World & The West”(1958)。

註二：同註一。

註三：此為郭松燾語。

註四：徐桐，大學士倭仁的弟子。一生提倡滅洋。及義和團失敗，八國聯軍入京後，他跟他大

兒子上吊自殺。

註五：湯恩比的「挑戰——回應」有三種模式。現代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回應是極度的失敗；日本則是成功。

註六：錢穆，民族與文化，香港新亞書院。

註七：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台灣正中書局。

註八：錢穆，中國歷史精神，台灣三民書局。

註九：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

註十：同註七。

註十一：金耀基，現代化與知識份子，台灣時報公司。

註十二：同註十一。

註十三：引自殷海光著「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一文。

註十四：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註十五：同註十三。

註十六：同註十三。

註十七：此書成稿於一九一四，於一九一八年初版。原書以德文寫成。現國內有陳曉林譯本(桂冠)。

註十八：意者可參考周策縱先生所著「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哈佛大學出版)或夏志清先生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國內有傳記文學社的譯本。

註十九：見註十一，第八頁。

註二十：見逢耀東著「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時報。

註廿一：見唐德剛著，「胡適雜憶」。

註廿二：同註十三。

註廿三：同註十三。

註廿四：見金耀基「在民主到處退却中前進」一文。